



劳务合同与劳动合同是一回事吗?

什么是劳动合同?为什么必须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定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依据。

订立劳动合同有以下作用:

- 第一,明确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
- 第二,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利益;
- 第三,成为解决劳动争议的有效法律依据。

什么是劳务合同?劳务合同与劳动合同是一回事吗

劳务合同与劳动合同有着本质的区别:

- 二者的法律性质不同
- 对合同主体要求不同
- 合同主体的地位不同
- 合同的内容不同
- 确定报酬的原则不同

在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付劳动报酬、劳动福利待遇等,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务合同中的劳务价格是按等价有偿的原则支付。

整理:甘哲 制图:曲欣悦

最高检:对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劳动争议依法支持起诉

本报讯(记者卢越)5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厅厅长冯小光介绍,全国民事检察工作立足民事检察职能助力精准脱贫,对农民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请求给付劳动报酬、抚养费、抚育费、赡养费、损害赔偿等案件,依法开展支持起诉,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截至2019年11月,全国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共支持起诉13800余件,其中支持农民工起诉9000余件。

“妥善办理涉疫情防控劳动争议案件,依法保障相关企业复工复产。”冯小光介绍,要妥善化解劳动者因治疗、隔离、企业因疫情停工停产、延迟支付报酬等引发的劳动争议,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引导企业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民事检察部门在办理上述案件时,要加强与人社部门、劳动人事仲裁机构、人民法院的联动协作,尽可能通过促成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为相关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法治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之变:过去进城挣钱、回乡花钱,如今落户中小城市、成为新居民

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关心薪酬,更注重发展

代表委员表示,融入城市要有一技之长,工作才能真正稳定

阅 读 提 示

今年我国将完成1亿人口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的新型城镇化规划。而随着中小城市放宽落户标准、生活成本比大城市低、子女上学更容易,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一味选择大城市就业,而是更倾向于落户中小城市,成为新居民。这在记者所采访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口中得到印证。与此同时,代表委员表示,农民工融入城市要有一技之长,这样工作才能真正稳定,也才能在中小城市站稳脚跟。

本报记者 赵剑影 杨召奎 王群 赵航 李丹青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大家传统印象里的农民工了。今年受疫情影响,很多农民工就在家门口的中小城市就业,甚至创办企业,还为当地吸纳就业做出了贡献。”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茨营镇袁家营村村民袁海波说,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不只关心薪酬、更注重配套环境和发展空间,就业偏好了新变化。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我国将引导1亿人口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今年以来,已经有近80个城市发布人才政策,仅4月份就有近30个城市跟进。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会城市以外,已经基本取消城市落户限制。而随着中小城市放宽落户标准,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更倾向于扎根中小城市、成为新居民?《工人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代表委员。

在中小城市打工更实惠

“以前农民工进城,都是到一、二线城市打工。现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大城市表面上收入很高,但成本也高,净收入是少的。”全国人大代表、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的高级技师鹿新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沈阳打工每月收入3000元,除去租房1000多元,每月用于生活消费的费用并不多。如果在家门口的中小城镇就业,可以减少租房费用,实际收入可能更高。

刚从郑州一家体育实业公司考察回来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收发现,该公司招工情况不太理想,往年派遣工人1万人左右,而当前才2000多人,今年受疫情影响,孩子没有复课,一些农民工在家出不去。他们

更希望能就近就业,相比去大城市,在中小城市打工更实惠。

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数据显示,2019年农民工总量约2.91亿人,比2018年增加了241万人。农民工跨省流动继续减少,更倾向于在“家门口”就业。其中,到省外就业农民工人数同比下降了1.1%,省内就业农民工同比增加了0.9%。这是农民工跨省流动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

近几年,张全收代表在派遣劳务时发现,伴随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等政策机遇,一大批制造业、服务业项目加快落地,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岗位,拓宽了本地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的渠道。一些农民工逐渐从东部地区回流到本地,实现了就近就业、省内就业。

“一方面是大城市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给一些打工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扶贫项目、工业园区、扶贫车间、公益岗位等吸引了一大批农民工就近就业。此外,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增速快于东部地区,也进一步增强了农民工本地就业的吸引力。”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新乡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认为,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小城市公共资源进一步优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乡差距逐步减小。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中小城市新居民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探秘宣纸传统制作工艺

5月11日,安徽省泾县宣纸厂工人正在进行捞纸作业。

在宣纸的原产地安徽省泾县,至今仍沿用着明清鼎盛时期生产宣纸的捞纸、晒纸、剪纸等100多道纯手工工序,整个制作周期至少历时一年。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务工3年可落户、就近上岗有奖补、挣钱就在家门口

重庆200余扶贫车间复工 贫困户变身农民工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通讯员 吴长飞

“一个月有3000多元收入,公司还买了‘五险一金’,在家门口把钱挣了。”5月18日,重庆涪陵陶市镇大桥村村民尚闽在美心红酒小镇的就业扶贫车间,一边包装面条,一边高兴地告诉记者。如今,因为这个扶贫车间,已经有42位村民像尚闽一样,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这仅仅是重庆市帮助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一个缩影。记者日前从重庆市扶贫办了解到,截至目前,重庆市已有近800万农民工外出就业,其中贫困劳动力超过71万人。

家乡就业一次性用工奖补

“在家门口找工作,这是头一回。”重庆綦江区东溪镇三台村贫困户吴显桃说,这些年一直在广州打工,今年因疫情滞留在家。经过参观企业、接受面试、询问待遇等环节,她决定留在永和齿轮公司务工,一个月工资3000多元。

为抓好农民工、贫困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就业,綦江区人力社保局搭建平台收集全区3000余名待就业贫困劳动力的职业技能信息。同时,把全区200多家企业的岗位需求信息也纳

入进来。对区属重点项目、区属工业企业新招聘綦江籍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职工,区里分别给予企业200元/人、劳动者300元/人、人力资源机构100元/人的一次性用工奖补。

此外,綦江区还计划开发公益性岗位3000个以上,截至5月15日,已安置2511人就业,其中贫困劳动力就业1211人,并将公益性岗位作为贫困劳动力的托底性岗位。

解决小微企业资金短缺难题

为推动企业顺利生产,重庆武隆区实施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预计将减免社保费7000万元,惠及全区731家参保单位及其员工,促进稳定就业。”武隆区人社局局长肖朝旭说。此外武隆区还发放扶持创业贷款4072万元,直接帮助278户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解决了资金短缺难题,带动就业900余人。

武隆区还积极搭建对接平台,持续开展线上线下的“春风行动”及就业援助活动,提供就业岗位8000余个,达成就业意向1000余人。

消除务工者后顾之忧

5月17日,重庆黔江区金溪镇被服厂扶

贫车间里,缝纫机嗡嗡作响。20余名戴着口罩的工人,正在赶制年前的订单产品。

坐在缝纫机旁,贫困户曾晓林说:“每月能有近2000元工资。”此前,她为了照顾小孩和老人无法外出务工。像曾小林这样从贫困户变身农民工,就近就业,不仅缓解家庭经济压力,还能照顾家庭。

据了解,重庆市采取居家就业模式或熟练工在车间轮班上岗、杂工居家加工相结合的方式复工,有效解决了贫困群众家门口就业难的问题。

据统计,截至目前,重庆市已有210家“扶贫车间”复工,贫困户变身农民工,带动就业人数14782人,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8821人。

与此同时,重庆市务工经商落户遵循“放开放宽”原则,设置差别化落户条件。放宽在主城区市区的务工经商类落户条件,将务工及社保年限由最高5年统一放宽到3年,投资创业年限由2年放宽到1年;取消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投资创业落户1年以上的年限限制,不再作年限要求;取消“一区两群”各区域内跨区(县)务工经商落户年限限制,实现户口通迁,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后顾之忧。

动力向中小城市聚集。“在中小城市就业,生活压力比在大城市小很多,还能解决落户和子女上学问题,这对我们的吸引力更大。”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中建五局总承包公司项目质量管理员邹彬说,和过去农民工多数以进城挣钱、回乡花钱目的不同,更多年轻的农民工更想扎根城市,而中小城市也更容易融入。

成为新居民要有一技之长

“工作要真正稳定必须要有一技之长,从事第三产业也需要提高技能。”为介绍菜单苦练外语的胡春霞代表,对于农民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很深的认识。“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实现稳定就业,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社会交往能力、思想道德水准和技术技能。农民工自身要有市民意识,加快观念转变,形成与城市化生活状态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培训,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奠定个人素质基础,政企合作解决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

“近些年,国家已经出台了扶持政策,如何落实好是关键。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则面临如何提升自身职业能力的问题。”张晓庆代表认为,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提高劳动技能,有一技之长;另一方面还要稳步提升一线岗位的工资待遇水平,提高岗位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把农民工正式纳入城市就业体系中,实现劳动力市场资源科学配置。

全国政协委员、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宿州供电公司输电带电作业班副班长许启金提议,把农民工真正纳入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体系。他认为要在就业帮扶、技能提升、职业发展、职称荣誉、权益保护、参政议政等方面,对农民工与传统产业工人无差别管理、一揽子建设。这部分人的素质能力上去了,产业升级就有了人的支撑,稳定就业就托住了底板。

专家学者“云上”共议尘肺病问题

呼吁建立尘肺病农民专项保障机制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5月16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九三学社中央医药卫生专门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举办线上“推动解决尘肺病农民问题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以及尘肺病农民代表,针对当前中国尘肺病预防、保障、治疗及康复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呼吁建立尘肺病农民专项保障机制。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97.5万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87.3万例,约占报告职业病病例总数的90%,而农民工群体是尘肺病的高发人群。

在研讨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副所长孙承业指出,尘肺病农民工患病后,自救能力很弱。主要在于尘肺病农民工这一群体,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很多未参加工伤保险,也没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机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说,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虽然制定了规范的诊断、认定工伤和待遇保障办法,但对没有劳动关系、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尘肺病农民工,则缺少制度性保障办法。部分大病保险、专项补助等政策的实施情况不尽理想,补偿政策实施不到位、不普遍,尘肺病农民享受不到救助待遇。“即使有些已经有政策的地区,仍存在着保障缺口、不连续和不稳定的问题。”

对于尘肺病农民工救助问题,孙承业建议,建立尘肺病农民专项保障机制,由中央政府财政补助、工伤保险结余资金、省级政府财政支持及涉尘企业多方出资,用以保障尘肺病患者医疗救治支付费用、基本生活费用以及康复部分费用。“但这一工作需要我们与国家卫健委、财政部等,多方共同努力来实现,也是我们今年和今后一段时间共同努力的方向。”孙承业说。

对于尘肺病防治问题,四川华锦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志伟谈到了职业病防治法中企业防治职业病的主体责任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职业病防治法在执行过程中与其他法律结合不是太严密,在主体责任的落实方面还存在一定漏洞;企业的职业健康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体系,一些企业老板想把事情做好但是不太懂,需要加强培训与服务;政府部门非常重视职业健康工作,但是执法体系、执法资源和执法方式都存在一定缺陷,需要完善。